

红色百年 奋斗百年

当年“虎烈拉”为何肆虐北平？

1 老北京防疫逐步推进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推进一系列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卫生防疫工作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以北京为例，由市政机构和官办医院主导的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北地区历来是传染病的多发之地。2月到5月流行的天花、2月到4月流行的白喉和脑膜炎、3月到7月流行的猩红热和回归热，4月到7月流行的斑疹伤寒，7月到9月流行的霍乱、伤寒和痢疾，秋冬时节随时可能暴发的肺鼠疫……简直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所以，民国后，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被当时北平市政府列为重中之重，最具有标志性的便是在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开办了传染病医院。按理说这里人口稠密，并不适合传染病医院的设立，但考虑到“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诊”，故作权宜。几年后移至天坛的神乐署，后因就诊人数的增多和天坛过于偏僻，又迁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天坛的神乐署改成临时防疫医院。

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附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一年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

国专设防疫机关之始。中央防疫处占地80余亩，除办公室、图书室、售品室外，技术室连亘数十间，内有锅炉房、培养基室、实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素室、血清室、鼠疫接种室、检查室、冰室、汽火室、冷藏室、动物室、疫苗室、狂犬病疫苗室、药品器械库等，技术设备在当时可谓先进而完善。

随着医疗设施的完善，针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也得到有条不紊地推进，以免费的种痘为例，1910年北京官方才逐步推进，到1932年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一律施行。此外各种舆论宣传也加紧跟上，除了媒体报道章之外，宣传种痘的传单、标语和种痘券也都由各自坊分发给居民，甚至还在每周二由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宣传，这样到1937年的春季，原本预计的种痘人数为7万人，实际达到了105248人，可以称得上成就斐然了。

除了上述预防手段外，在应对突发情况上，市政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要求执业医生每周将各种异常症状向卫生机构汇报，这样一来，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会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

这一切，随着卢沟桥上的枪声响起，被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踩断。

1943年的8月，巨大的阴云突然笼罩在了北平的上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了导致数千市民死亡的“虎烈拉事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起惨剧，但在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依然可以体会到那可悲和可怖的一幕。



(资料图片)

3 到底是谁散布了“虎烈拉”？

从“虎烈拉”暴发那一刻开始，北平市民就对其起因议论纷纷。在侵略者的枪口和刺刀下，任何真相都不可被揭示，最终人们只能归结于是混合面不干净导致的。据王永斌考据，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2000年《北京崇文区志》出版前，而《北京崇文区志》所揭开的真相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次给北平市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事件，完全是日寇刻意所为。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并在天坛内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

负责1855部队的细菌生产和细菌研制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部队十分庞大，定员1500人，除了占有天坛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很多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仅工作室就有100多间。该研究所研究并制造的“细菌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前者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十余种，后者包括布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球孢子菌等。1940年10月28日，由石井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带了70公斤的伤寒菌、50公斤的霍乱菌和5公斤染有鼠疫菌

的跳蚤，乘坐飞机到宁波市上空进行散布，未及3天就在宁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1943年的“虎烈拉”大暴发，也是1855部队犯下的罪行。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境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截至十月底，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当时，西村英二命令受训的250多名候补下士官，上街检疫，将

染疫者全部羁留，然后烧死或活埋。仅据战犯长田友吉供认，就有300多名中国人被日军害死。事后，日军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

至此，“虎烈拉”大暴发的真相已经昭然天下。尤为可怖的是，1942年春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冀中被八路军捕获，据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和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视占领区如细菌战实验室，视占领区人民为小白鼠，这就是日寇鼓吹的“王道乐土”。（据《北京晚报》）

古代就有脱口秀 还有成熟段子集

艺人幽默机智发挥令人捧腹 曹操竟然笑到“以头没杯案中”



东汉击鼓说唱俑。

些陶俑大多装扮可笑，动作滑稽，面部表情怪异，大约是当时俳优表演的一种夸张再现。很多陶俑手中还持有圆形扁鼓和鼓槌，当为伴奏之用，说明俳优表演富有节奏，或者是带有伴奏的说唱形式。

三国时期俳优表演更加受欢迎。《三国志》援引《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娱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

除了正式表演，即兴发挥同样重要。据传，有一次唐玄宗与诸王宴会，宁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错喉”（吃呛了），一下喷到了唐玄宗的胡子上，这可把宁王吓得不轻。侍奉在旁边的优人黄幡绰忙说，宁王这不是“错喉”，是“喷帝”（谐音喷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刘备初据成都时，诸事草创，手下

的许慈和胡潜互不服气，经常争斗。为此刘备专门在宴会上让俳优扮演成两人的样子，互相争论打斗，通过引起大家发笑来感化他们。

当时的“段子”和成熟的“段子集”是最早的笑话专著。《唐书·参军戏》记载：“参军戏类似于相声‘谐音梗’，其内容主要是以调侃人的生理缺陷为主，并不文雅。不过，此时已经有了专门的‘段子手’和成熟的‘段子集’。邯郸淳所著的《笑林》，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著。”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为搞笑艺人的存在提供了丰厚土壤。《乐府杂录》记载，当时的俳优表演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范式，类型包括参军戏、弄媳妇人、弄婆罗门、弄孔子等等。其中参军戏一般为双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相声，而“弄媳妇人”则是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

除了正式表演，即兴发挥同样重要。据传，有一次唐玄宗与诸王宴会，宁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错喉”（吃呛了），一下喷到了唐玄宗的胡子上，这可把宁王吓得不轻。侍奉在旁边的优人黄幡绰忙说，宁王这不是“错喉”，是“喷帝”（谐音喷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宋代的“脱口秀”表演已经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据《厦门晚报》）

笑，机智地用“谐音梗”化解了尴尬。

宋代民间有喜剧比赛 表演有专门场所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幽默表演向民间的发展。《鸡肋篇》记载，成都西园开园的时候，“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女左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宋代的喜剧比赛，全靠观众的笑声投票，哪边的表演能赢得哄堂大笑，就可以得一分，绝对公平合理。

宋代还兴起了一种“说话”表演，类似于现在的说书，讲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传奇故事、历史故事、公案故事、佛经故事等。此外还有一种“说话”的内容是“说话”，大约应是一种搞笑表演，与现在的脱口秀相似。

宋代的“说话”演出，大多在瓦舍勾栏中举行。当时的瓦舍勾栏众多，遍布京城的繁华地段。瓦舍又名瓦子、瓦市、瓦肆，是一种集商业饮食、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中心。勾栏是瓦舍中用栏栅和绳子围起来的演出场地，相当于现在的露天剧场。所以宋代的“脱口秀”表演已经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据《厦门晚报》）

唐朝的凤池

唐朝诗人间时兴“和诗”，即一人先咏，然后，一人或三两人应和而诗，现在也叫同题诗。在唐长安“千官之宫”的大明宫，围绕着“凤池”，曾经发生了贾至与王维、杜甫、岑参四位诗人，相与唱和的逸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春天，当时，贾至、杜甫、王维、岑参同僚。作为中书舍人的贾至最先写了《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诗：“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接着，杜甫、王维、岑参三位和《早朝大明宫》。其中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有“池上今有凤毛”之句；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曰“佩声归到凤池头”；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中有“独有凤凰池上客”之句。

对于凤池，唐代诗人趋之若鹜，他们不厌其烦地去写。因而唐代写凤池的诗句太多，数不胜数、蔚然大观。“凤池”几乎成为唐明时代第一大主题，也是诗人采用最多的意象之一。诗人李白、刘禹锡、杜牧、白居易、韩愈、韦应物、武元衡、卢象等均有关于“凤池”的诗句流传后世。

关于凤池，有几种说法。凤池或凤凰池，本是皇帝禁苑中的池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而中书省因设于禁苑，掌管机要，接近皇帝，其地位比尚书省更为重要，故而有“凤凰池”和“凤池”之称。至唐时，门下省、中书省在禁中左右掖，给事中属门下省，房中办公地点就在凤凰池。凤池之称还与古琴有关，古琴底有二孔，上孔曰龙池，下孔曰凤池。凤池也是砚的一种，宋范仲淹《端溪砚谱》：“砚之形制……曰凤池。”

（据《西安晚报》）